

敵人的狂論

第二期 抗戰展開後



後開展戰抗期二第

論 狂 的 人 敵

譯 選 弦 童

戰第二期抗敵人的狂論

選譯者 韋弦

出版者 建國書店

發行人 賀復萌

總經售 教育書店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廣州教育路第八號

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版出日十二月四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選譯者序言

戰時我國黨軍政界和智識界乃至一般民衆所最急需的常識，莫如敵國的真實國情和代表的言論之窺探和報告了。這不特能助軍事上得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把握，且助後方人士洞悉敵國的陰謀，作適當的準備乃至言論上的批駁及反宣傳，使我國人民明知敵人把事實歪曲了，甚或故意造謠，到什麼程度，纔不致受其麻醉，而自亂其「最後勝利」的信心和勇氣。同時還可藉為宣傳上的一種批駁的口實，使外國人也一同明瞭敵方的詭計及無理。

本書所選譯的資料，就是實行着上述的意旨。其內容是：（一）松本重治所作：中日的事變已入第二期，（二）馬場恒吾所作：議會和政局的收拾，（三）長谷川與山本及一原三人的對話，（四）船山信一所：現代日本作的思想形態，（五）上崎孝之助

所作；對華文化政策之明白，（六）二見甚鄉所作；關於中日紛爭解決上的示唆。我們細閱這六篇東西的內容，總可得到以下幾種的新智識：（1）敵人至今仍以「親善」爲假裝的口號，要想用「口蜜腹劍」的毒計，引誘我們早晚解除敵意，入他們的牢籠。（2）敵方的智識界，明知自己作賊心虛，處處流露厭戰的口吻，却因受着軍閥的高壓，粉飾勝利以取媚，表面似乎要勸我方息戰，而裏頭實爲他們自己救苦救難的計。（3）他們因對於侵畧的罪惡無可諱飾，竟強詞奪理地說到我們的國民性和他們的不對，我們的黨國政治和他們的專制政治不符，我們的最高領袖不合他們的脾胃，兩國間的懸案，必要照他們的意旨解決，這樣對於一般事實的歪曲和誤解，還敢明目張胆地堅持着，可認爲敵人真沒有悔禍之心。（4）我們通觀這六篇東西，覺得敵人欲早結束戰事之故，無非欲早得實行其經濟侵畧的手段。一切僞政權的組織企圖與僞文化的宣傳政策，都是爲其最後的經濟侵畧之方便物。而其經濟侵畧的鬼謀，是有幾分抄襲那種「布洛克的經濟組織」（Beocsystem）——也可譯作「封鎖的經濟圈

組織」，即是要完全以我國爲原料的取給地和商品的銷售地，而仰他們爲經濟同盟的宗主國，這樣，中國遂完成爲他們的禁臠。這種毒計，他們的經濟學者，在「九一八」以前已曾主張過，我們是不能不特爲揭破的。

在這六篇東西之中，最覺無理取鬧的，是最後二見甚鄉那一篇，他直白承認這次的侵畧戰，不是由少數軍閥的包辦，實由於敵人全國的公意。這種狂論，或者是有意取媚於軍閥，未必是他們全國公認的。獨有馬場恒吾那一篇，暗寓着對於軍閥的諷刺，承認敵國壓制輿論之非計，並且承認國會對於國策的決定上有檢討和動識修改之權。這或可代表敵國中的元老派的意見之一部，他有些地方雖仍替軍閥辯罪，但仍不如二見氏之極端。總之，十個敵人之中，有九個半是陷於「誇大狂」，現在第二期戰事方展開，我方在節節勝利之中，把敵人這種「誇大狂」的話來反觀一下，正覺得可憐還可笑呢！

內容目次

中日事變已入第二期

一 事變已入第二期

二 蔣氏不肯屈辱的心境

三 中國共產黨抬起頭來了

四 事變和德英美的態度

五 結論——新責任的醒覺

議會和戰局的收拾

長谷川和山本實彥對話

現代日本的思想形態

對華文化政策之明日

一 文化事業的意義

二 中國的文化現狀

三 對華文化事業再建設的基本和方向

關於中日紛爭解決上的示唆

中日的事變已入第二期

松本重治著

一 事變已入第二期

中日的事變，到了現在，已入于第二期了。上海，南京，杭州等既已陷落，山東的大勢已定，皇軍的威勢，至此已算是南北相應，津浦線以東的廣大區域也被制壓下去了。舊臘在張家口已經成立「蒙疆自治聯盟政府」，繼而北京也成立新政權，到了新年，分在重慶，漢口，長沙三處的國民政府，也迫於新事態而改組了。英美兵艦的被炸事件，和上海的租界問題，年末雖見緊急，但現在也算表面落着了。在第一期的六個月內，是以戰爭爲主，挫華之武力的目的已算實現。宋美齡所誇稱的空軍，已受致命的打擊，中國全國的制空權，是操在日人之手裏，中國軍的損失八十萬，已失却積極的抵抗力。日本國的全民，均感到皇軍將士的忠勇辛苦。

第一期戰爭的結果聳動世界的耳目，華北則佔領內蒙，河北，山西，山東等省，南方則江蘇，浙江省的大城市均為日有，包括北平，天津，濟南，上海，南京，杭州六大都市在內，鐵路的哩數佔有全中國本部之半。合日滿計，皇化領土的人口實三億八千萬，單從數量上觀，已算在日本歷史上為民族最大的飛躍期。

在第一期是採「戰爭工作中心主義」，現入第二期，是為目的達成上所必需之實力行使的繼續，與確保第一期的戰事結果之復興建設工作，及其他一般政治工作之遂行為其特徵。第一期的活動為單純的，直截的，而第二期的問題則極形複雜。在第二期的開始時，日本的國民。應暫捨下祝捷的杯而加以着實的考慮，遭着這樣空前的大事業，須具有絕不退轉的決心，與大陸經營的經綸。最要的前提條件，是在於事實的真相之把握，與一般情勢之正確的認識。缺於事實的直觀與趨勢的明察，則大經綸的實現成為不可能。斷行的決意，反有成為仇恨的危險。

鑑於日本國內的廉價報紙與一般非科學的人們之無反省的批評的橫行，站在事

變之第一線的人們，決不能安枕無憂的。這個問題是太深刻了，責任也太大了，應先對真實的討究上採着謙抑的態度，纔可論百年的國策。無論處着怎樣的非常時期，這種公理是永久不謬的。戰局愈展開，中國方面的秘密消息也愈加嚴禁起來，日本國內的人民，是愈難洞悉事實的真相。且因宣傳的運動太盛，一見似乎真實的消息，仍屬難靠。以上所述的話，作者也不是認為絕對真實的，祇是以大致可信者為根據，而推測前途的趨勢。

二 蔣氏不肯屈辱的心境

這一次的事變，日本是與好幾種勢力相鬥，蔣氏是其中之一，中國的共產黨也是其中之一。對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是與以根本的打擊，及對於蘇俄的進出，則採迎擊之態。但直接當面的對手則為蔣氏。中國陸空軍總帥「民族復興運動」領袖之蔣氏，國民政府之實權者的蔣氏，雖在日本否認國民黨，並與國民政府絕交後，尙

成爲對手的存在。與蔣氏對手，非關講和與否，現在仍指他是屬隣接國的實權者。

日本雖經承認北京的臨時政府爲正式政府時，而其政府支配地及殘餘的中國本部在事實上之隣接關係是存續，這是不能否認的。謂蔣氏爲對立的存在，那麼，究竟到了什麼時候，仍是存在呢？這是成問題的。（關於「蔣氏的持續力」問題，可參考改造雜誌本年正月號新進的中國研究家岩村三千夫所著之文）。但論到蔣氏存在至何時之一問題，若非論及抵抗日本武力進出之具體的蔣氏，則墮於抽象論了。從大乘的理想說，雖離却抗日的蔣氏之現象性，則赤裸的蔣氏也充分可成問題，但在現實的客觀情勢中，這是難成爲問題的。平心來說，現在祇是抗日的蔣氏成爲問題。其持續性論亦本此。

故抗日與蔣氏是不可分的。即蔣汪合作時之「攘外必先安內」的大方針，前年夏間經過和廣西安協及年杪經過西安事變的結果，迫使轉換爲「攘外即安內」「安內即攘外」的新方針。對於以實力行使爲背景之日本的大陸進出，已不許以「攘外必先安

內爲口實，甘受中國的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毀損。前年七月，二中全會的宣言，本認主權的侵畧不至當時以上的程度尚可，侵畧超過以上的程度時始行抵抗。嗣至西南和西安兩事件，則成爲「現存的主權毀損狀態要積極矯正」之約束（三全中會宣言）。西南和西安兩事件，是因蔣氏進行雜軍整理和剿匪的工作太過而起之反動的事件，兩事件結束後，國府的抗日策加重積極性者，實由於桂派和人民戰線派所迫而來。

蔣政權的長期抵抗的決心，在中國國內究竟有什麼源由呢？國內是有蔣氏的長期抵抗藉英俄的助力一元論，這已成爲共通的觀念。關於英國方面的援助之點，本文以後再述，倘若英國絕援則使中國屈服，這一點實爲拒絕日本求援的中國民族之一種屈辱。以上既說蔣氏之積極抵抗多由於國內事情，且舉桂派和人民戰線派，這兩者以積極抵抗或對日即時開戰爲方便的口號者，因知能得到較廣泛的智識階級和少壯軍人的同情，從而可以操縱輿論。至於蔣氏之不肯捨長期抵抗者，因以現在的

實力爲前提故不能捨，祇拿長期抵抗來做招牌是最安全的。以長期抵抗爲前提而生出主權擁護的問題，故又與國內統一爲表裏一貫的思想。（這裏所謂「國內的統一」，大體是有以漢族統一爲第一階段的傾向，至于內外蒙，新疆等邊地，似乎是暫且置之）。

皇軍在南京行正式入城式之早朝，蔣氏發出聲明，謂日軍一日對中國領土的侵略不停止，中國的抵抗也一日不停止。這裏「抵抗不止」的宣言，似乎反映着在第一期中國的陸空軍實力喪失之狀，而漸入於第二期的戰畧之變更。總之，蔣氏之抵抗不止主義，是由於西安事變之直前，張學良曾對蔣氏說及「和日本妥協，而反使國內同胞自相屠殺之愚」，蔣氏得意地答道：「我的念頭，正在把華人對於自己領土的保衛力表示中外」，那種聲明之延長而來。

三 中國共產黨抬頭起來了

巧於利用事變而能抬頭來的，是中國共產黨。自「八、一」的宣言以至西安事變直前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本已有秋風落葉的頽狀。由瑞金出走，橫行中國本部七千哩，在前年秋間，已使蔣氏發出「今後一月即可以剿完」的豪語了。西安事「二、一二」的兵諫事件，是由於蔣氏的防衛疏忽而來，紅軍的戰力雖然不是可怕的，但「八、一」宣言之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組織運動的將來性是可怕的。以後一年有奇，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果然以北方為中心，逐漸壓迫華中，紅軍竟由中央供給軍器和軍費，以陝西為中心而作強有力的再編。是以在中國戰爭上最得到實益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八路軍，以後是當特別注意的。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先屈後伸主義。「七、二三」及「九、二二」兩個宣言，表示捨棄社會主義而反依三民主義，這非單屈服於國民黨，實在還兼顧到英、美、法、德、意等國的態度，當然是還經過第三國際和蘇聯的諒解，這裏也可間接窺見蘇聯的對華政策。中國共產黨為中國內部的一種政治勢力，而蘇聯乃屬外部的一個聯邦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之華中的進出

，縱使不得蘇聯的援助也有可能的社會政治條件，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對日作戰時，蘇聯和日本間仍能維持漁業的協約及其他一般外交和通商關係。陝西方面和莫斯科的兩大中心，雖然與國民政府的接洽，是分出兩個方途，但此二系間的外交和政治工作，是能確實保持聯絡無疑。其顯明的例證，是在於「九、二二」的宣言和中蘇不侵犯條約之前後產出。

本來蔣氏與蘇聯間，在去年八月不侵犯協約未成立以前，可說是完全互不相信。中日在年之前，經過張羣和川越間數月的交涉後，也曾正式提及「防共協定」的問題。這個協定實在是以阻止蘇聯的進出為中心目標，那麼，就可見蘇聯的感想是怎樣了。蔣氏在一九二七年間，是為共產黨的壓抑者，在一九三三年蘇聯所提議之商約改訂與不侵犯條約案，在蔣汪合作之下，未曾認為有一顧之價值，蘇聯的不信任觀念因此益深。張羣川越交涉以後的蘇聯態度，是冷淡的，當中國要求飛機和軍器的協助時，蘇聯似曾答覆以不訂不侵犯條約以表示誠意，各事尙談不到等語。蘇聯